



《红灯记》： 半个世纪的风雨往事

□荆文

您知道吗？现代京剧《红灯记》最初是由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来的。时隔半个世纪，《红灯记》故事的最初讲述者罗国士、沈默君的名字，被知情者从尘封的历史中拭亮。然而，在当年那部署名为“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中，究竟还有多少名字应该为人们铭记？究竟还有多少故事不为人们所知？

林默涵给阿甲打来电话

1963年10月的一天，北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接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电话，让他抓紧时间来文化部一趟。阿甲此时并不知道，林默涵是要他去取一个剧本，而这个剧本将会改变他与许多人的生轨迹。

这个有着巨大“魔力”的剧本，正是后来成为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由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自电影文学剧

本《自有后来人》。

谁创作了京剧《红灯记》

“当时，剧本上谁的名字也没有，就是‘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

如今提起《红灯记》，上了些年纪的人能想起的是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或许还能叫得上扮演者的名字：钱浩梁、刘长瑜、高玉倩……

然而，倘若拂去历史的尘埃，为《红灯记》的主创人员列一张名单，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导演阿甲与剧作家翁偶虹的名字应该列在首位，正是他们二人历经艰辛，九易其稿，最终合力完成了《红灯记》的剧本改编。

“还有李少春，当年李玉和的唱段、舞蹈动作等基本上是由他设计的，李奶奶的唱段是由李金泉设计的，那可真是下了功夫，把英雄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立起来了！”两年前，在国家京剧院，记者见到了当

年曾在剧中饰演王连举的孙洪勋老人，他是第一批参与《红灯记》创排的演员。时年74岁高龄的他，说起《红灯记》来，仍是满眼的光彩。

同来的还有当年负责乐队编配的张建民老人，时年也已76岁了。老人说：“我原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1964年京剧院要搞现代戏，需要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加入，刘吉典先生就把我叫来了。”谈到《红灯记》的音乐创作，清瘦的张建民老人十分谦虚，他始终称自己是个“打杂的”，“音乐方面一直是刘吉典领导，李广伯也做了不少工作。”李广伯是当时中国京剧院的京二胡演奏者，由于李少春、李金泉都不会记谱，就由他负责理顺、记录他们设计的唱段。

京剧“现代化”举步维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热切地期待看到反映革命斗争

和新生活、新气象的现代戏。于是，各个剧团开始进行各种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和尝试，比如加入西洋音乐、演绎现代人物等等。

然而，用数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戏曲固定程式来演绎现代戏，绝非易事。

“同样是跑圆场，我们过去是勾着脚面跑，因为要表现舞台上花旦的轻盈。如果演李铁梅也那样勾着脚面、压着脚步跑，那就太滑稽了。”刘长瑜因扮演《红灯记》中的铁梅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和喜爱。如今她虽已步入老年，眼神里却依然透着少女般的天真活泼。她告诉记者，京剧的“现代化”让他们经历了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

刘长瑜坦言，自己当年饰演李铁梅也曾走过一些弯路。“铁梅是个小姑娘，按原来花旦的演法，是甜美的、笑咪咪的，踩着小碎步出场。铁梅却不能这样，她要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恨。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就专门批评过我。”

“这是一个艰苦的再创造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在戏曲道路上发展的里程碑。”刘长瑜回忆说。

在音乐的改良方面，张建民他们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戏里有《国际歌》的旋律，必须要表现气势，而只有民乐队肯定不行，后来就根据于会泳的经验，加入西洋乐

器，改成了大乐队，这在以前的京剧里是没有的。”张建民说，在这种中西乐器结合的乐队中，既要表现出“气势”，又要突出京剧的“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是很难做到的。“没有政治巨浪的冲击，实行起来很困难，习惯形成的阻力很大。所以说，这是从思想上的革命到方法、技术上的革命。”

戏里戏外的悲喜人生

当时，只要说错一句台词，或在排练、演出中耽误了一点时间，就成了“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要召开大会进行批判。

1966年“文革”爆发后，《红灯记》被列为样板戏之首。然而，这出样板戏的大多数创排者，却未能与自己的作品一道成为革命的“样板”，他们反而经历了自己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阿甲、李少春、刘吉典等人因为抵制江青，被打成“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遭到批斗，受尽屈辱。

刘长瑜因出身问题被打成“狗崽子”、“修正主义黑苗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周总理为了帮助她，在一次会议上有意识地讲：“刘长瑜跟我一样，是旧官僚家庭出身；但是她现在也跟我一样，叛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红灯记》是革命的戏嘛。”由于总理的这番话，刘

长瑜虽仍然挨整，却一直在演李铁梅。

高玉倩被打成了“特务嫌疑犯”。后来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得以解放，并在《红灯记》中成功扮演了李奶奶。

袁世海也被江青一伙赶下了舞台，他饰演的鸠山一角被别人顶替。仍是在周总理的帮助下，袁世海才得以重返舞台，继续参演《红灯记》，只是“不能挂名、不能谢幕”。

与同伴们的遭遇不同，钱浩梁有幸成为《红灯记》中唯一的“样板”人物。李少春被关押后，李玉和一角由钱浩梁正式担纲演出，他的名字也被江青授意改成了“浩亮”。由于钱浩梁的形象英武高大，颇具英雄风范，他饰演的李玉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江青对这位憨厚的年轻演员颇为赏识，于是，钱浩梁接连被提拔，后来竟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当时平步青云的还有于会泳，他原为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专攻民族音乐，对京剧的程式、唱腔尤为内行，为《海港》、《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设计的唱腔得到了江青的赏识，遂升任文化部部长。

对于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来说，那段日子仍然像噩梦一样，难以抹去。刘长瑜说，当年由于长时期过度紧张，她一度患了神经性皮炎，而另一位演员因为说错了一句台词，惊恐过度，从此患上了心脏病。

回到人民手中的瑰宝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阿甲等人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而与此同时，样板戏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各地的剧团都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恢复传统戏。

直到1987年，为了纪念阿甲先生从艺60周年，现代京剧《红灯记》作为纪念演出剧目得以复排。在这一年，《红灯记》的大多数原班人马（其中李玉和由孙岳出演）时隔多年重聚舞台，完美地重现了当年的这部经典作品。

现任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尹晓东见证了重演《红灯记》时的盛况。“当时确实是盛况空前。剧场的走廊上全站满了人，演员在台上唱，观众在下面跟着哼唱，连什么地方该念什么台词都记得清清楚楚。演出结束后，演员谢幕谢了很长时间，观众都不让他们离开……”

贺敬之看完戏后，感慨地对演职员们说：“《红灯记》就像一个由人民创造的艺术瑰宝，一度被坏人拿去了，现在又回到了真正的创造者手中。”

从当年《红灯记》登上舞台至今，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红灯记》的唱腔仍不时回响在全国各地的文艺舞台上。在许多人心中，它已经从当年的“样板戏”变成了“怀旧戏”。步入老年的人们，能够在它的旋律中找回

逝去的青春岁月，而中青年人则试图通过它来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

《红灯记》原班人马今安在

在《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至今仍担任国家京剧院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她经常手把手地教授年轻演员，从吐字、发音、走台步等一点一滴着手，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已届耄耋的高玉倩除了腿脚不便，需要靠轮椅代步外，精神尚好。当年负责作曲的刘吉典和饰演磨刀人的谷春章等几位老演员也都还健在。

当年的编剧翁偶虹、阿甲，扮演鸠山的袁世海，扮演小伍长的刘鸣啸以及担任美术的郭大有、赵金生等都已辞世。音乐方面的原班人马中，鼓师、琴师和京二胡演奏者均已作古，张建民仍然健在，并一直在中国戏曲学院带研究生。

或许有不少人很想了解钱浩梁的近况。“四人帮”倒台之后，钱浩梁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隔离审查数年后，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又回到中国京剧院等候分配。而于会泳则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隔离审查，其间服毒自杀。

1983年，年近五旬的钱浩梁被调往河北省艺术学校执教，受到艺校领导、师生的热烈欢迎。多年来头一回

被人尊称为“钱老师”的他，异常感激，眼里噙着泪花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一定努力工作……”在艺校期间，钱浩梁以突出的业务水平和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赢得了师生们的普遍尊重。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时年58岁的他，演出中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倒在了舞台上，丧失知觉前的瞬间，他遗憾而又无奈地看着大幕“哗”地拉上了……钱浩梁得了脑溢血，1992年底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省艺校的教师生涯。

晚年的钱浩梁除了赋闲休养，有时也看报、看电视。据说，他最爱看体育节目，而京剧节目基本不看。莫非这是一个执著于京剧艺术的人难以重返舞台的内心悲凉？如今，钱浩梁夫妇过着半隐居生活，除了与几个知根知底的老朋友稍有来往，基本上闭门谢客。一旦有人认出衰老了的“李玉和”，他的老伴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有些像而已”。他们从不主动与外人说话，若有人上前搭讪，他们也避犹不及，惟恐让人家受到牵连，他们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钱浩梁希望人们忘了他，平安度过余生是他最大的心愿。

只想被人们遗忘的钱浩梁，无论是荣是辱，人们会真的遗忘他吗？^①